

# 什叶派宗教领袖发展轨迹

## ——从十二伊玛目派谈起

王 丽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什叶”意为“宗派、同党”后来专指拥护阿里的人,故称什叶派或阿里派。该派认为只有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及其后代才有资格成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即哈里发。四大哈里发的前三位和后来伍麦叶时代、阿拔斯时代的哈里发被视为非法。什叶派因在伊玛目数目及谁是最后一位“隐遁的伊玛目”问题上的分歧分成不同支派,主要有十二伊玛目派、栽德派和伊斯玛仪派,但主流派别是十二伊玛目派。本文主要从十二伊玛目派谈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发展轨迹。

十二伊玛目派是什叶派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派,是今伊朗的国教,该派因承认阿里及其后裔十二人为伊玛目而得名。

### 一. 伊玛目时代

“伊玛目”原意为“标志”,“榜样”、“领袖”,什叶派拥立阿里为伊玛目以后,这一名称成为对什叶派最高领袖的专用语,但后来也用以表示“一般穆斯林事务的主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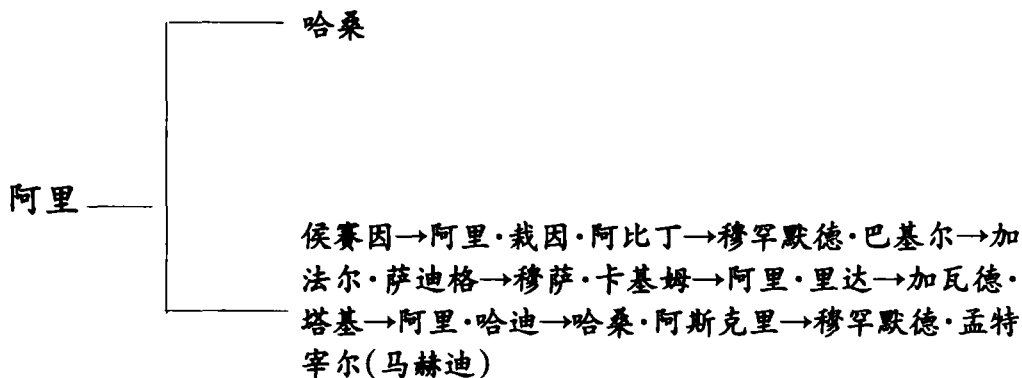
下表构成了十二伊玛目派的伊玛目时代,在该时代该派有明确的宗教领袖。阿里被尊为第一位伊玛目,在其继承哈里发之后,与穆阿威叶(当时叙利亚总督,后伍麦叶王朝创始人)在675年进行了绥芬战役,阿里获胜。但穆阿威叶使出计谋,让士兵用长矛挑着《古兰经》高呼“惟有真主才能裁决。”迫于压力,阿里不得不接受停战和仲裁。这使得阿里派内部发生了

分化,一部分人离开阿里,被称为“退出者”或“反叛者”,即“哈瓦利吉派”。后来阿里被该派的阿卜杜·拉赫曼·本·穆勒贾姆·穆拉迪刺杀在库法的清真寺。阿里去世后,穆阿威叶(661—680在位)控制了局势建立伍麦叶王朝(661—750)。

阿里被杀后,伊拉克的穆斯林拥戴阿里的儿子哈桑为哈里发,即第二位伊玛目。由于穆阿威叶当时占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哈桑接受了穆阿威叶的条件,自动放弃哈里发职位,回到麦地那,直到670年去世。

哈桑死后,他的弟弟侯赛因继承阿里党人的领导权,即第三位伊玛目。680年,穆阿威叶去世,在去世前,让所有穆斯林向他的儿子叶齐德(680—683在位)效忠。这一对正常惯例的背离,激起各地穆斯林强烈反对。侯赛因拒绝向叶齐德效忠,这时库法人认为时机成熟,写信要求侯赛因去库法领导他们推翻伍麦叶王朝。680年9月10日(伊历60年12月8日),侯赛因离开麦加向库法进发,跟随侯赛因的有他的家人和少量随从。由于伍麦叶王朝对库法人的镇压,库法人并未履行诺言给侯赛因提供帮助。在卡尔巴拉,伍麦叶军队将侯赛因的队伍包围起来。伊斯兰教历61年1月10日(680年10月10日),侯赛因战死,首级被送往大马士革宫廷。这就是著名的卡尔巴拉惨案,惨案发生的这一天正是教历的穆赫兰月(1月)的第十日,即阿舒拉日。这天后来成为什叶派一个

## 十二伊玛目派世系表



重大节日——阿舒拉节,在这天人们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侯赛因殉难。这件事成为什叶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阿里派纯粹是一个政治派别,但在侯赛因殉难之后,这个政治派别开始提出自己的神学观点,向神学派别转化。侯赛因殉难还决定了只有侯赛因的后裔才有资格担任伊玛目,因为哈桑放弃了自己的伊玛目权利,而侯赛因则坚持斗争。

侯赛因之后的伊玛目,大多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只是作为什叶派精神领袖。其中颇有所为的是第六位伊玛目加法尔·萨迪格。加法尔·萨迪格一生从事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在教法方面有突出造诣。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对什叶派的“哈里发——伊玛目”理论是个重大打击,什叶派需要对伊玛目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这项工作由加法尔完成。他首先提出在一定时期内伊玛目和哈里发是两个分离的职位,可以由不同的人担任,伊玛目不是必须担任哈里发。但是伊玛目必须是阿里和法图麦所生的先知的后代,他的绝对权威不是来自政治要求,而是来自“指定”,即前一任伊玛目明确的指定,他继承了家族代代相传的宗教知识。加法尔·萨迪格意识到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对什叶派造成的理论冲击,他通过确立“指定”和“知识”两项原则,解释什叶派面临的理论困境。加法尔的追随者被称为加法尔派,它是十二伊玛目派的

前身。

第十一伊玛目哈桑·阿斯科里去世后,没有留下子嗣,什叶派内部就这个问题产生分歧。经过不断争论,认为哈桑·阿斯科里有一个叫穆罕默德的儿子,出生于869年或870年,但是他出生以后,出于“塔基亚”(谨防)原则考虑,他的父亲将他隐藏起来,这一观点最终占主导地位,成为十二伊玛目派正统信仰。根据什叶派正统教义,真主在第十二伊玛目的父亲去世当天将穆罕默德隐藏起来。第十二伊玛目开始隐遁,但他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当真主允许的时候,作为马赫迪他会再次出现,并将征服全世界。

以上就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伊玛目时代。在该时代,什叶派有明确的宗教领袖,如前所述,他们被称为“伊玛目”。什叶派的教义学家认为伊玛目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第一,委派伊玛目是真主的意志和恩典。什叶派教法学家认为,根据真主派先知引导众人的原理,在先知归真之后,有必要在为他们选派伊玛目。伊玛目将执行安拉的意志,阻止动乱和腐化堕落。第二,伊玛目“无罪”,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之一。什叶派教义认为伊玛目不会犯错,他们超脱于一切大小罪过,即使在成为伊玛目之前,甚至是孩童时代,都不会犯错。第三,伊玛目是中保人。在现代伊斯兰教中,逊尼

派和什叶派都把穆罕默德在审判之日为人说情列为必需的信条。在什叶派中,还强调伊玛目的中保作用,而且中保和说情观念更为突出。第四,伊玛目学识非凡,德行完美高超。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则不足成为凡人的楷模。什叶派教义学家特别强调阿里的超凡脱俗。

什叶派伊玛目时代结束后,宗教领袖发展经历了四大代理人时代(874—941年)。在此之后,谁将成为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倍受争议的问题。1502年伊朗萨法维王朝尊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第一任国王伊斯马仪一世自称是隐遁伊玛目的代理人,而穆智台希德(有资格进行“独立判断”的教义学家)被认为是隐遁伊玛目的代言人和他与人民之间的中介。这实质上提高了王权,削弱从属于王权的宗教学者地位,反映了当时什叶派宗教学者地位较王权来说是从属于其的。随着宗教学者地位不断提升,乌莱玛(宗教学者)开始完全独立于国王,恢复了作为隐遁伊玛目代表的权利,从而成为什叶派国家权威的合法来源。这样什叶派的宗教领袖由国王转移到宗教学者,即穆智台希德。从而什叶派宗教领袖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重要时代,即“效仿的源泉”时代。

## 二. “效仿的源泉”

“效仿的源泉”诞生于穆智台希德中,是它的最高层次,因此“效仿的源泉”是隐遁伊玛目的最高代言人,被称为大阿亚图拉(真主的迹象),人们只有通过他才能接触伊玛目。

在立法和释法过程中,穆智台希德能在传统伊斯兰教法理论体系的架构内部进行“创制”(伊智提哈德)。在实践上,意味着某一现实的法律问题,如在经、训中均无据可依,则可以以类似的经、训基本原则为前提通过分析、归纳、比较等方法,作出新的解释。由此产生了“效仿的源泉”在法律上的权威性。

根据什叶派教义,人们在罪恶的世界不能进行善恶区分,因而需要指导。没有这种指导,大多数人很容易迷失方向,落入邪恶之中,而

穆智台希德便是指导者。19世纪具有创制资格的宗教学者数量猛增,资深的穆智台希德成为“效仿的源泉”。“效仿的源泉”就是个体信徒将关于信仰的责任转移到他的身上,完全服从他的判断、追随他的决定。在原则上,每一个穆智台希德都是“效仿的源泉”。但自19世纪以来,倾向于将某个人确定为最高权威,他是唯一的“效仿的源泉”,是宗教学者中的最高等级。

第一个被广泛公认的效仿的源泉是谢赫穆罕默德·哈桑·伊本·巴基尔·纳贾非,他的著作《教义学精髓》是萨法维王朝以后最重要的教法学著作。他被称为“乌莱玛领袖”和“伊玛目的代理人”。在其去世之前,指定他的学生谢赫·塔伊法(意为“教派长老”)穆尔台扎·迪兹富里·安萨里继承自己的地位。他不仅被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接受为效仿的源泉,而且也得到土耳其、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等地什叶派承认,是第一个得到整个什叶派世界公认的效仿的源泉,具有最高效仿的源泉的身份。最高效仿源泉的出现也标志着什叶派教阶制度的形成。

什叶派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效仿的源泉”则是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霍梅尼。霍梅尼以宗教学者的身份在20世纪60、70年代与伊朗各种政治力量角逐,提出“伊斯兰政府和教法学家统治”理论,并最终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神权政治国家。他之所以能够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部分原因出于他的效仿源泉的身份。

从1979年以前的伊朗来看,“效仿的源泉”是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一些重大政治、社会活动,都是由被称为“效仿的源泉”的大阿亚图拉领导,例如1891年12月,穆罕默德·哈桑·设拉齐发布教令,宣布禁止销售和使用烟草的“伊朗反对烟草特许权运动”等等。

什叶派教义需要“效仿的源泉”。那么,什么样的穆智台希德才能担当此重任?乌苏勒派(什叶派正统教法学派,崇尚理性主义)在接纳创制观念之后,对创制的执行者穆智台希德提

出了限定条件,在身体和身份方面包括成年、理性、男性、信仰、公正和出身合法等六项基本条件和识字、耳聪目明、为人自由等附加条件。在知识方面的条件包括教义学、基本信仰、语法、阿拉伯语、逻辑学和教法渊源。因而只有满足以上条件的穆智台希德才能成为“效仿的源泉”,成为大阿亚图拉。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效仿的源泉”与“伊玛目时代”不同,在伊玛目时代宗教领袖是“指定”的,而到“效仿的源泉”时代,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不是由血统、家庭所决定的,而是个人后天的努力所决定,也就是说“效仿的源泉”的形成机制是公开、公正、公平、开放,而且充满

竞争力和活力。同时也不是由国王任命或者前任推荐。

从“伊玛目时代”到“效仿的源泉”,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有明确宗教领袖到伊玛目代理人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什叶派教义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什叶派宗教领袖由“指定”到民主的过程,这反映了其宗教领袖发展轨迹。但是,这种轨迹也容易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专制。例如,1979年到1989年期间的伊朗被认为是毛拉(霍梅尼)专政时期。在1989年以后,伊朗所进行的务实、开明的改革,尤其是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改革,使这一消极影响逐渐减弱。

### “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认知与编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 and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认知与编撰”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9月22-23日北京洋桥大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出席并致开幕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代表亚洲研究中心致贺词,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20余位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着“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认知与编撰”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编纂的回顾与展望”、“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地域特点”、“道教与民间宗教资料的类型,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之外的资料类型”、“道教文献及其认知”等四个主要论题展开。本次与会发表的学术论文,代表了目前道教学术的前沿水平。

这次会议不仅回顾和总结了以往道教与民间宗教领域内的基础建设成果,还反映了该研究领域内新的发展态势和新的方向,体现了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和不断扩大的新视野,显示出更加关注道教与民间宗教领域的前沿性和前瞻性问题的倾向。正如卓新平所长在致辞中指出,对于整个宗教学,特别是中国宗教学研究来说,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前沿进展与研究成果具有非常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试图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的话,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道教与民间宗教方面的历史经验,毕竟它们是真正的本土资源,又是异常丰富的理论资源。(林巧薇)